

抗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对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

闫语, 赵俊莹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发布日期: 2025年11月26日

摘要

抗战时期, 受国际传播格局与意识形态偏见影响, 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形象存在显著认知偏差。保卫中国同盟及其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以下简称《通讯》), 以英汉双语多模态文本为载体, 成为纠正认知偏差、建构中共正面海外形象的关键媒介。本研究以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为核心, 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 系统剖析《通讯》的形象建构路径: 通过视觉、语言、行为等多模态协同, 构建起中共“抗战先锋”“民生公仆”“国际合作者”三大核心形象。效果验证表明, 《通讯》突破国民党信息封锁, 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认知从“神秘化”“妖魔化”转向“具体化”“正面化”。研究不仅还原了《通讯》的传播价值, 其多模态协同策略也为传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关键的中流砥柱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 中国共产党; 海外形象; 多模态建构; 抗战时期; 跨文化传播

The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the Overseas Image of the CPC by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u Yan. Junying Zhao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and ideological prejudic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had significant cognitive bias towards the image of the CP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PC"). China Defense League and its official publication, "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ewsletter"), is a key medium for

文章引用: 闫语, 赵俊莹. (2025). 抗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对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J]. 文史哲论丛, 1(2), 58-66.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24

correcting cognitive biases and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overseas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sing English Chinese bilingual multimodal texts as carriers. This study take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s the core, combined wit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mage construction path of "Newsletter":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modalities such as vision, language, and behavior, three core ima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mely "Anti Japanese War Pioneer", "Livelihood Public Servant",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or", are constructed. The effectiveness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Newsletter" broke through the Kuomintang's information blockade and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percep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mystification" and "demonization" to "concretization" and "positivity". The study not only restored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of "Newsletter", but also provided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the communication that the CPC is the mainstay of the key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seas image; Multimodal construc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武装力量凭借“人民战争”模式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据史料统计，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共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有效牵制了日军对华作战兵力的 60% 以上（1941 年后）。然而，这一关键贡献在国际舆论场中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格信息封锁，致使西方媒体长期受其单方面叙事主导；另一方面，冷战思维萌芽下的意识形态滤镜，使部分国际舆论将中共简单标签化为“激进革命势力”，忽视其“民族独立优先于阶级斗争”的抗战立场与“民主民生并重”的治理追求。

在此背景下，1938 年由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 CDL），及其机关刊物《通讯》，凭借英汉双语发行优势与覆盖国际援华组织、海外侨社、外国政府机构的传播网络，成为填补国际舆论缺口的核心载体。它既突破信息封锁，向世界揭示敌后战场的真实面貌，又通过多模态文本重塑中共的国际身份认同。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7】《通讯》的传播为反法西斯阵营理解中国抗战全局、认可中共角色搭建关键沟通桥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1 日，第 1 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938 年至 1941 年《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含中英文版本）的多模态文本，选取该时段刊物作为研究样本的核心依据是：此阶段为抗战关键时期，该刊作为保盟核心传播载体，其传播内容兼具真实性与针对性，且留存了完整的文字、图片、数据等多模态符号素材。基于上述研究对象，本文核心研究问题如下：一是《通讯》多模态文本（文字、视觉、行为模态）的构成特征与互动机制是

什么? 二是多模态符号如何协同建构中共“抗战先锋”“民生公仆”“国际合作者”三大核心形象? 三是该刊多模态形象建构对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具有何种实践启示?

2. 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涵盖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跨文化传播理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由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与特奥多·范·莱文 (Theodoor van Leeuwen) 于 1996 年在《阅读图像: 视觉设计的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中提出, 源于社会符号学, 强调多模态符号的协同作用, 认为多模态符号系统通过“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 实现对现实的表征与解读, 在视觉模态分析层面提出“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取景”(Framing)、“情态”(Modality) 四要素 (Kress & van Leeuwen, 1996:12,58-72)。跨文化传播理论以吉尔特·霍夫斯泰德 (Geert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为核心, 该理论通过对 IBM 员工的调研, 提出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Masculinity/Femininity)、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Long-Term Orientation/Short-Term Orientation) 五大文化维度 (Hofstede, 1980: 21-45)。

在本研究中,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为解析《通讯》多模态文本提供方法论, 可揭示视觉模态对“军民一体”形象的强化作用及语言模态的跨文化转译策略; 跨文化传播理论用于分析《通讯》的跨语境适配性, 如“问题——解决”叙事契合低权力距离文化偏好, 数据化呈现降低国际受众“不确定性规避”心理, 为研究其跨文化传播有效性提供依据。

3. 《通讯》多模态文本与中共核心形象的协同建构

3.1. 《通讯》文本分析

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建构是一个系统性的国际传播工程, 其本质是通过多模态符号的协同运作, 将党的政治理念、价值追求和执政实践, 转化为国际社会可感知、可理解、可认同的立体形象体系。《通讯》通过多维度传播系统性塑造了中共“积极抗日、关爱民生、开放包容”的三维国际形象, 具体通过多模态文本的协同叙事, 聚焦“抗战先锋”“民生公仆”“国际合作者”三大核心形象, 每个形象均依托具体案例与适配传播策略形成完整叙事逻辑链, 共同构成国际社会认知中共的符号体系。

(一) “抗战先锋”形象: 从文本表征到形象落地

《通讯》以“军民共抗”为核心主题, 依托“人民战争”模式, 通过文字、图片、数据表格的多模态协同, 将中共“先进政治理念的践行者”特质转化为“抗战先锋”形象。文字模态以英汉双语详细记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关键战役的战术部署与战果, 明确提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共作战 12.5 万余次, 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的核心数据, 以“灵活作战”“坚韧不拔”等术语强化战斗特质; 视觉模态选取八路军战士持枪作战、军民协同防御的战地照片, 将士兵与民众互动场景置于画面中心 (高信息值), 传递“军民共抗”的战斗氛围; 数据表格清晰罗列敌后战场歼敌数量、牵制日军兵力占比等信息, 增强叙事客观性与说服力。

基于 Kress 与 van Leeuwen 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通讯》(英文版) 中的战地照片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取景”三维度的符号配置, 系统建构了中共军队的国际认知形象。在装备呈现上, 照片刻意将简陋武器置于视觉焦点 (高显著性): 1939 年 7 月的通讯中, 一名士兵手持自制土枪的特写占据版面 1/3 篇幅, 背景以模糊的山地轮廓弱化处理, 通过“武器——环境”的清晰度对比, 强化“以

弱抗强”的抗争符号。这种构图策略既符合多模态理论中的“情态”原则——低技术装备与真实战场环境的高相似度提升可信度,又暗合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将物质劣势转化为“精神韧性”的文化吸引力,使国际受众感知中共军队“超越物质条件的抗争意志”。

此形象塑造以国际影响力典型战役为载体,通过数据化呈现与战略性阐释凸显军事担当。对百团大战的报道详细记录“大小战斗 265 次、击毙 11000 名日军、破坏 210 英里铁路与 270 英里公路”的战果(《通讯》1940 年第 22 期)【4】,并强调作战目标的战略性——通过破袭日军交通线与补给网络,削弱其对正面战场的攻势压力,将敌后战场局部战斗纳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框架,传递“中共军队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分担压力”的核心信息。相较于国民党正面战场“阵地防御”叙事,《通讯》突出“敌后游击”战术创新,描述“避开日军主力、以分散作战渗透敌占区”的策略,呼应国际社会对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期待,强化“坚韧善战”的军事形象认知。

这种多模态文本表征形成清晰建构逻辑:文字叙事提供事实支撑与价值导向,明确中共抗战的战略意义;视觉图片以具象化符号补充抽象表述,让国际受众直观感知作战场景;数据表格以客观数据打破认知偏见,印证“抗战先锋”实力,三者协同突破国民党信息封锁下的舆论遮蔽。

(二)“民生公仆”形象:从文本叙事到形象感知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共统治区域的“激进主义”偏见,《通讯》紧扣“中共重视民生、依靠民众”的价值内核,通过多元模态传递治理理念,构建“重视民生、务实治理”的“民生公仆”形象。语言模态采用“问题——解决”式叙事结构,1943 年医疗专题开篇以“Shensi-Kansu-Ningshia Border Region has only 1 doctor per 50,000 people”的精准数据呈现困境,契合低权力距离文化对“问题透明化”的偏好,继而详述“training barefoot doctors”的解决路径,最终以“300 new medical stations established in 1942”的成果数据收尾,形成“问题——对策——成效”闭环论证,在国际公共领域构建“中共具备民生治理能力”的话语合法性。文本既呈现医疗服务数量,更强调“本土化培养”的治理逻辑——通过培训本地医护人员构建可持续医疗体系,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援助,凸显“立足民生需求”的理念。

教育报道以“800 village schools built”等可验证数据构建务实叙事框架,聚焦“窑洞小学”“抗日教材”等战时创新实践,提及“边区儿童入学率较战前提升超三成,教师自编教材融合文化知识与民族精神教育”(《通讯》1941 年第 32 期)【4】,既回应“战时教育中断”的担忧,又通过“资源有限但成效显著”的对比,塑造“坚守民生底线”的积极形象,间接反驳“中共忽视民生”的不实传言。

形象感知层面,视觉模态以真实场景凸显“以人为本”的实践底色,1939 年 10 月 20 日《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新刊第 9 期丁聪《生产与抵抗》配图最具代表性:农民田间劳作姿态与身旁步枪形成视觉呼应(高信息值),农田肌理与农具细节构成“生产——抵抗”符号关联,低饱和度色彩符合多模态“自然主义”风格,强化场景真实性。这种“生产与武装并存”的视觉叙事,传递“军民一体”的核心意义,印证敌后根据地“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生存智慧,让国际受众直观感知中共贴近民众的特质。教育与医疗报道则以关键数据构建务实叙事,如“边区儿童入学率较战前提升超三成”“1942 年新建 300 所医疗站”(《通讯》1941 年第 32 期),以“资源有限但成效显著”的对比,回应国际社会担忧,塑造“坚守民生底线”的形象。

(三)“国际合作者”形象:从文本表述到形象认同

《通讯》立足“人民战争”模式的开放特质,以跨文化传播为导向,通过多模态文本适配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文本表述到国际认同的“国际合作者”形象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始于语言模态的精准适配:通过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核心理念进行精准英汉翻译,避免文化隔阂,同时强调“反法西斯联动”的叙事框架,主动对接国际反法西斯话语体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英文

版中被译为“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并附加括号注释“including all parties and classes for national survival”。这种译法严格遵循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再现意义”转译原则：保留“United Front”这一国际左翼运动熟悉的术语（符号共识），补充说明强化“民族性”维度，避免被解读为单纯的阶级联盟。从跨文化传播理论看，这一处理显著降低了国际受众（尤其是欧美读者）的“不确定性规避”心理——通过明确构成要素，使抽象政治概念转化为可理解的“合作框架”。

“国际主义”的英译选择“International Solidarity”而非“Internationalism”，体现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应用智慧：“Solidarity”（团结）更契合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对“共同目标”的认知偏好，规避“Internationalism”可能携带的意识形态联想。1940年致英美援华团体的专文中，该术语与“world anti-fascist struggle”高频共现，通过语义关联将中共的国际立场纳入全球反法西斯话语体系，既符合跨文化传播的“框架适配”原则，又依据国家形象理论中的“外交政策道义性”维度，塑造中共为“负责任的国际合作者”。

形象感知层面，视觉模态选取国际友人参与边区救治、中外人士共同商讨抗战策略的照片，以“取景”手法凸显合作场景，传递“开放包容”姿态。《通讯》曾描述“白求恩将自己的血输给受伤战士”（《通讯》1940年第24期）【4】，将“生命互助”场景升华为“国际主义精神”的象征，展现与国际力量的深度协作；行为模态以宋庆龄撰写发刊词、国际友人记录边区见闻的形式强化真实性，反复刊载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疗人员，以及詹姆斯·贝特兰、爱泼斯坦等新闻工作者的事迹与报告，宋庆龄曾鼓励贝特兰深入前线采写，称其文章“写得好极了，读来令人精神振奋”【4】，多元身份的亲历叙述以“他者见证”增强说服力。

此外，《通讯》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斗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整体叙事，提出“中国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亚洲千万民众将成为建立自由世界的重要力量”（《通讯》1939年第8期）【4】，以“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定位（1941年第34期）【4】，强调敌后战场在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价值，强化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关联性，赋予中共“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身份，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是国际反法西斯协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形象建构逻辑清晰：语言模态的跨文化适配消除传播障碍；视觉模态的合作场景以具象符号传递“开放合作”信号；第三方见证增强形象可信度与认同感，多模态文本协同推动“国际合作者”形象从文本表述转化为国际认同。

3.2. 多模态协同的形象建构机制

视觉与语言模态的协同运作形成完整意义链：战地照片以“军民共抗”为视觉核心（高信息值）时，配套英文报道必用“united front”等术语强化概念关联；边区建设的“问题——解决”叙事，总会搭配对比性照片（如改造前后的村庄）增强视觉佐证。这种协同符合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整体意义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在国际传播中实现三重效果：

符号层面：视觉与语言的互文性消除跨文化理解障碍，战士帮农民修筑工事、农民为战士运送物资的画面，与“united front”（统一战线）术语精准匹配，将具象场景升华为政治理念的视觉佐证，弱化政治宣传的生硬感，让海外受众从“可感知的画面”中理解“不可见的政治理念”；

话语层面：通过公共领域的理性叙事获得国际舆论话语权，图像提供感性认知，文字提供理性数据，二者构成“有图有真相”的叙事闭环，契合“模态互补强化说服力”的观点，使中共抗战叙事获得理性权威，让海外读者认可“中共领导的抗战是全民性、有效性抗争”；

价值层面：将具体实践转化为软实力符号，图像中军民并肩的场景打破海外对中国政治的刻板印象，传递“中共重视民生、依靠民众”的价值内核，语言模态的术语阐释将其升华为政治理念，使“人民

战争”模式具备国际可理解性, 让中共形象从“抗战力量”演变为“先进政治理念的践行者”, 为争取国际支持提供符号化认知基础。

《通讯》中“军民共抗”主题的多模态协同, 通过符号互文、话语权威建构与价值转化, 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机制, 既符合多模态功能文体学的理论逻辑, 又在实践中有效推动中共海外形象建构, 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多模态实践提供历史镜鉴。

3.3. 行为模态：多元主体的形象赋力

行为模态通过不同身份主体的叙事与见证, 强化中共“民主、包容”形象的说服力, 核心逻辑是借助多元主体的真实经历, 降低传播“宣传感”, 提升国际受众的信任度与接受度。

宋庆龄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核心发起人, 其“孙中山夫人”的历史符号与“国际和平人士”的定位, 使其言论具有特殊权威性与传播力。1939年第6期《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中, 她从国际视角阐述中国抗战的全球意义, 间接肯定中共贡献【4】; 1940年第18期《中国: 世界和你们》中, 进一步明确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 并直接肯定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成就【4】, 这种从“间接关联”到“直接肯定”的递进, 符合国际传播渐进规律, 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认同。

《通讯》广泛引入国际友人的战地报告、书信与见闻, 以“第三方视角”提供客观补充。1939年第9期杰姆斯·贝特兰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 详述中共领导下医疗组织的运作情况【4】; 1940年第15期约翰·F.福斯特牧师的见闻, 从社会生态角度反映边区治理实况【4】; 1940年第19期《来信概要(马海德大夫)》, 呈现中共内部团结与军民一体的细节【4】。这些国际友人身份各异——记者关注客观事实, 牧师侧重社会生态, 医生聚焦民生细节, 但均指向共同认知: 中共治理下的边区展现民主与包容特质, 其“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姿态契合国际受众对“真实见证”的诉求, 有效规避单向宣传的抵触, 将抽象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

形象类型为传播提供框架锚点, 行为模态通过具体主体与案例填充框架, 赋予形象细节与温度: 军事形象结合国际友人战地报告(如贝特兰)与战役数据, 增强真实性与感染力; 民生形象依托宋庆龄的权威肯定与医疗、教育案例, 传递治理温度; 国际形象借助国际友人参与及多元主体互动, 拓展全球视野。这些形象建构体现中共民主与包容特质的有机统一: 民主重在民生关怀与基层参与, 包容彰显于国际合作与开放胸襟, 二者相互支撑、彼此印证, 构成中共政治理念的完整表达。这一逻辑在《通讯》的全球叙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通过明确提出“中国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通讯》1939年第8期), 并以“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战略定位(1941年第34期), 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整体叙事, 凸显其在牵制日军、支援盟军方面的战略价值。这种以真实案例为基础、借多元主体叙事传递价值的传播方法, 既保证国际传播的方向性, 又通过共情修辞赋予细节感染力与情感共鸣, 不仅在抗战时期有效消解国际舆论认知壁垒, 其内在逻辑也为当代跨文化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4】【5】。

行为模态通过不同身份主体的叙事与见证, 强化中共“民主、包容”形象的说服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借助多元主体的真实经历, 降低传播的“宣传感”, 提升国际受众对中共形象的信任度与接受度。

宋庆龄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核心发起人, 其言论在《通讯》中具有特殊的权威性与传播力。这种权威源于她的双重身份: “孙中山夫人”的历史符号使其成为中国进步力量的代表, “国际和平人士”的定位则让国际社会对其言论有天然的信任感。例如, 在1939年第6期《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宋庆龄—孙逸仙夫人)》中, 宋庆龄从国际视角阐述中国抗战的全球意义, 间接肯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贡献。【7】至1940年第18期《中国: 世界和你们(宋庆龄—孙逸仙夫人)》, 她进一步明确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 并直接肯定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成就。【7】这种从“间接关联”到“直接肯

定”的递进,既符合国际传播的渐进规律,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认同。。

《通讯》广泛引入国际友人的战地报告、书信与见闻,以“第三方视角”提供客观补充,强化形象传播的真实感。例如,1939年第9期杰姆斯·贝特兰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详述中共领导下的医疗组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运作情况。【7】1940年第15期约翰·F.福斯特牧师的见闻,以亲历者视角,从社会生态角度反映边区治理的实际情况。【7】1940年第19期《来信概要(马海德大夫)》,以其长期参与根据地医疗工作的经历,呈现中共内部团结与军民一体的生动细节。【7】这些国际友人身份各异——记者关注客观事实,牧师侧重社会生态,医生聚焦民生细节,但他们的叙述指向了共同的认知:中共治理下的边区展现出民主与包容的特质。此类亲历者叙事以“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姿态,契合国际受众对“真实见证”的心理诉求,有效规避单向宣传可能引发的抵触,从而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

形象类型为传播提供框架锚点,如“抗战先锋”“民生公仆”“国际合作者”等定位;行为模式则通过具体主体与案例填充框架,赋予形象以细节与温度。军事形象通过国际友人的战地报告(如贝特兰)与战役数据相结合,增强真实性与感染力;民生形象依托宋庆龄的权威肯定与医疗、教育案例的叙事,传递治理的温度;国际形象则借助国际友人的参与及多元主体互动,拓展全球视野。这些形象建构体现了中共民主与包容特质的有机统一:民主重在民生关怀与基层参与,包容彰显于国际合作与开放胸襟,二者相互支撑、彼此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共政治理念的完整表达。这种以真实案例为基础、借多元主体叙事传递价值的传播方法,既保证了国际传播的方向性,又通过共情修辞赋予其细节感染力与情感共鸣。该策略不仅在抗战时期有效消解了国际舆论的认知壁垒,其内在逻辑也为当代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7】【8】

另一方面,《通讯》致力于将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斗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整体叙事。它明确提出了“中国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亚洲千万民众将成为建立自由世界的重要力量”(《通讯》1939年第8期)【7】,并以“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定位(1941年第34期)【7】,强调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方面的战略价值。

这种叙事策略强化了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关联性,赋予其“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的身份,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不仅是中国内部的重要抗战力量,更是国际反法西斯协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4. 效果验证:《通讯》多模态传播的跨文化接受

4.1. 历史实证:国际舆论与受众反馈

《通讯》作为抗战时期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国际传播效果可通过以下两方面得到实证。

第一,海外媒体转载情况。尽管战时条件限制了西方主流媒体对《通讯》的直接转载,但其所构建的叙事通过国际援华组织网络进入了西方舆论空间。武燕军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研究》中指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作为“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在海外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9】在此背景下,《通讯》能够将关于“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讯息传递至“美国援华会”等组织并转化为实际援助,本身就证明了其传播的有效性。【7】

第二,国际人士反馈。陈红民、徐亮的研究表明中共积极利用海外平台发声。如1936年陈云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旨在突破国民党舆论封锁,澄清中共的国际形象。【10】同时,《通讯》刊载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医生的信函:“我在此间虽然有时感到不便,但精神上是十分愉快的……我相信我们医疗队在这里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帮助的。”【7】宋庆龄

也通过《通讯》向国际社会阐明：“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国外的朋友们……我们请你们帮助那些正在斗争中的人们”【7】，这一表述将中共的抗战事业提升至全球反法西斯民主斗争的高度。

4.2. 对比分析：同期不同文本的传播效果差异

为精确评估《通讯》的传播策略，本文将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对比分析。

第一，横向对比：与国民党官方外宣刊物、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叙事策略比较在核心策略上具有本质差异：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核心叙事紧紧围绕“人民战争”与“民主进步”展开，着力宣传敌后抗战的成就、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及社会改革实践。其报道主题高度具象化，例如通过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和国际和平医院、南泥湾大生产等典型事例，以情感化和故事化的表达来激发读者的共鸣与支持。

国民党官方外宣刊物（如《中央半月刊》）则构建了以“国家至上”与“领袖中心”为核心的叙事框架。其内容主要侧重于正面战场的报道、领袖活动的宣传以及对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在话语策略上，多采用程式化、宣导性的语言，旨在进行政策解读和理论灌输，官方色彩浓厚。

相比之下，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通常带有一种“他者视角”。尽管它们在报道中普遍遵循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但其叙事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体现在其对信息源与事实的选择性呈现上，并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构建其倾向性叙事，报道框架因而显得复杂而多元。

第二，纵向对比：《通讯》不同时期的叙事调整与效果变化。

《通讯》的叙事重心随抗战形势发展而呈现出清晰的战略调适：抗战初期（1938-1939）以唤起国际同情为首要目标，内容侧重于揭露日军暴行与报道正面战场概貌；抗战中后期（1940-1941）则随着相持阶段到来，将报道重心战略性转移至系统展示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军事韧性、民生建设与开放姿态，这一调整反映了《通讯》根据国际舆论关注点的变化而进行的策略优化，旨在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共是一支兼具军事战斗力、民生治理能力与国际合作精神的成熟政治力量。

5. 启示与反思：历史经验对当代国际传播的镜鉴

《通讯》的国际传播实践，对当下中国讲好自身故事、优化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四方面的重要历史启示。

第一，对符号策略的启示：多模态符号的生活化、具象化运用。《通讯》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抽象政策，具象化为“士兵与农民共同开垦土地”的视觉图像。当代国际传播可借鉴此道，善用短视频、VR 等现代媒介，将政策语言转化为“扶贫干部与村民共修道路”等可感知的生活场景。

第二，对叙事框架的启示：民间视角与微观叙事的情感穿透力。《通讯》摒弃宏大政治口号，采用“问题-解决”的微观叙事模式。例如，通过讲述“一个村庄因‘赤脚医生’计划而改变缺医少药困境”的具体案例，折射治理理念。【7】这提示当代传播者应善于运用个体故事展现国家发展。

第三，对传播效果的启示：理性数据与感性场景的协同验证。《通讯》在报道中，既提供“每五万人仅一名医生”的精准数据，也配发“医生在窑洞中实施手术”的现场照片，形成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佐证。【7】这种协同验证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内容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第四，现实局限与现代转化：结合当下媒体融合语境，探讨多模态叙事的创新路径。《通讯》受历史条件限制，其传播手段以纸质媒介为主。在媒体融合的当代，可以将其“民间视角+情感共鸣”的传播智慧，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谢广平的研究指出，我国外宣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焦点失准、忽视海外受众需求”等问题。【12】对此，可借鉴《通讯》的生活化叙事，在短视频平台推出“政策解读+个体叙事”系列，实现传统传播经验的现代转化。

参考文献

- [1] 雷茜. 多模态功能文体学 理论建构及应用 [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
- [2] Forceville C. Multimodal Metaphor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Kamala Harris's Rhetoric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5, 42 (2): 234-256.
- [3] 潘艳艳, 张辉. 多模态隐转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 以《经济学人》涉华政治漫画语篇为例 [J]. *现代外语*, 2017, 40 (2): 189-202.
- [4]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编辑委员会.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全集 (1938-1941)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0.
- [5] 李克, 朱虹宇. 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 (2): 110-118.
- [6] 武燕军.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宣传处 [J]. *历史档案*, 1990, (02): 126-130+137.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第1版).